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八 編 第 8 冊

乾嘉時期 文學爭論的研究

梁 結 玲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8冊

乾嘉時期文學爭論的研究

梁 結 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乾嘉時期文學爭論的研究／梁結玲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30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8 冊）

ISBN：978-986-322-384-9（精裝）

1. 清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8

102014643

ISBN-978-986-322-384-9



9 789863 22384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322-384-9

乾嘉時期文學爭論的研究

作 者 梁結玲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八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乾嘉時期文學爭論的研究

梁結玲 著

作者簡介

梁結玲，1972年11月生，廣西大新縣人，文學博士，副教授。2005年畢業於深圳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1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在國內期刊上發表論文20餘篇，研究方向：中國文化與詩學。

提 要

乾嘉時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時期，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與物質財富的迅速增長為學術與文學創作的繁榮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條件。這一時期的文學論爭主要來源於三股勢力：考據陣營、文學陣營、理學陣營。這三股力量既立足於歷史，又放眼於當代，都對文學進行了價值的判斷並由此而引發了爭論。乾嘉時期的漢學與宋學之爭是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關於考據與文學的爭論，雖然不少學人有所提及，但大多是湮沒在漢宋之爭的大話題之下。本書第一章就考據與文學之爭作專題研究，對爭論的源起、演變以及爭論的內容進行分析。清學自身的面目——考據學到了乾嘉才成熟，清代文學思想的總結與集成的特徵在乾嘉時期最為突出，而這一點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關注，總結與集成的特點在唐宋之爭上得到了明顯的反映。本書第二章主要論及乾嘉時期主要學人在對待唐詩與宋詩上的態度。清代駢文創作再度中興，乾嘉最為興盛，不少考據學者加入了創作的隊伍。駢散之爭的焦點集中在擅長駢文創作的考據學者與桐城派之間，他們之間的爭論實則是漢宋之爭在文學上的反映。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考據與文學之爭	5
1.1 考據的主流話語權與文學創作的繁榮	6
1.1.1 考據的時代主流話語權	6
1.1.2 乾嘉時期文學創作的繁榮	12
1.2 考據與文學之爭	17
1.2.1 爭論的起源	17
1.2.2 袁枚對考據的反駁	21
1.2.3 漢學家的文學觀：重考據，輕文學	68
1.2.4 乾嘉後學對袁枚言論的批判	75
1.3 考據、義理、文學的調和論	90
1.3.1 章學誠的調和論	92
1.3.2 姚鼐的調和論	104
1.3.3 翁方綱的調和論	108
1.3.4 其他漢學家的觀點	119
1.4 結 語	123

第二章 唐宋之爭	125
2.1 唐宋調和的成因	128
2.1.1 民族矛盾的緩和與社會經濟的發展	128
2.1.2 統治階級的有意引導	129
2.1.3 文學觀念的自身演變	134
2.2 沈德潛：格調論中的唐宋詩	139
2.2.1 前期的唐詩觀	141
2.2.2 後期的唐宋詩觀	152
2.3 性靈派的不分唐宋論	159
2.3.1 性靈派主將袁枚的不分唐宋	161
2.3.2 性靈派副將——趙翼	176
2.4 翁方綱的唐宋之論	179
2.4.1 以神韻抹平唐宋	181
2.4.2 由神韻向宋詩的努力	192
2.5 結語	206
第三章 駢散之爭	209
3.1 駢文與古文之爭	213
3.1.1 何者爲文	213
3.1.2 文何用	239
3.1.3 美何在	252
3.1.4 文法之爭	266
3.2 駢散合一	274
3.2.1 乾嘉前期的融合觀點	274
3.2.2 乾嘉後期的融合觀點	281
3.3 駢文、古文與八股文	287
3.4 結語	292
結語	295
參考文獻	299
後記	305

緒 論

十八世紀，西方完成了產業革命，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人類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在東方，清王朝進入了一個發展高峰，這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等都出現了繁榮，然而，清王朝的繁榮卻沒能持續太長的時間，表面強盛的帝國掩蓋不了日趨衰落的趨向，十八世紀成了東西方社會發展的分水嶺。十八世紀中葉，東西方幾乎同時進行一項偉大的圖書編纂工程，那就是《百科全書》和《四庫全書》。《百科全書》彙聚了狄德羅、達朗貝爾、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孔多塞、霍爾巴赫等一大批站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而四庫館也網羅了乾隆時期中國第一流的學者，然而，兩者的命運與使命卻截然不同。源於商業運作、倍受各國政府打壓的《百科全書》促進了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其結果，不僅影響了文學，而且最終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格局；而由官方主導的四庫全書的編纂沒有在學術理性的指引下開啓近代的科學與民主，在四庫館臣的推動之下，形成了注重經史考證的乾嘉學派。帝國的封閉與專制使得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得到了沉澱和再生產，總結與集成爲清代文化的一大特點。「乾嘉以後，號稱清學全盛時代，條理和分法雖比初期緻密許多，思想界卻已漸漸成爲化石了。」〔註1〕清代雖然沒有自己獨具特色的「一代之文學」，但各種文學體裁如詩歌、小說、詞、戲曲等創作數量眾多，詩話、詞話、文藝評論文章在數量上更遠遠超過之前的任何一個時代，而乾嘉時期尤爲清代之盛。

乾嘉考據學一直爲學界視爲清代學術的代表，從乾嘉後期一直到當代，

〔註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176頁。

乾嘉考據學的研究一直是清學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近十年來，大陸學者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乾嘉考據學的成因、流派、史學成就、音韻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漢宋之爭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突破了不少前期的觀點，成績是不小的。然而，與乾嘉考據學研究的熱鬧景象相比，乾嘉時期的文學研究不免冷清。改革開放前，乾嘉時期重要的作家如袁枚、蔣士銓、趙翼、姚鼐、翁方綱、黃景仁、方苞、劉大櫟等並沒有引起關注，除了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略有提及外，專門性的研究幾乎是空白。即如乾嘉詩壇影響最大的袁枚，第一篇系統介紹其文學思想並給予相對客觀評價的論文是王英志1982年的碩士論文《袁枚「性靈說」新探》，之後，研究才漸趨全面、深入。新時期以來，隨著思想大解放，乾嘉時期詩文研究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重要的作家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作品、文學思想都得到了比較深入的闡發，張健的《清代詩學研究》、王英志的《性靈派研究》等可視為這一時期文學思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近代以來，西方學術體系的引進將文學研究越來越走向專業化。中國文學理論學科的建立是在參照西方學術理論體系之下完成的，朱自清說道：「『文學批評』一語不用說是舶來的」〔註2〕。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研究仍然是建立在以純文學為基點的西方文學理論模式之上，這種人為割裂的研究方法猶如醫學解剖分析，將活生生的生命體肢解為各不相關的板塊，看不到活的靈魂與組成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將中國文學的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乾嘉時期的文學理論研究也不免此病，研究多是以純文學的眼光進行單兵作戰式的研究，縱向的單個詩人、學人的研究占主體，而能將文學理論研究還原於其原生態，充分考慮時代環境及學術文化特點的很少。即使能在橫向的比較中發現問題，也多是隨筆感悟式的發揮，缺乏深入細緻的分析。如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對乾嘉時期詩人們的交往、學術思想爭論有不少的點評，但多局限於羅列考證，沒有就問題的實質、內涵進行更深入的剖析，這是很可惜的。其實，在乾嘉時期，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純粹的詩人，在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多數的文人都給捲入其中。如袁枚，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他視為詩人，其實，這是不全面的。二十八卷的《隨園隨筆》說明了袁枚在考據上的成就，著作涉及經史、金石、天文輿地、官制典禮等，內容極其廣泛，若果對考據不甚

〔註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4頁。

瞭解，是不可能有如此成績的。從《隨筆》的內容上看，作者在考據上用的功夫著實不少，不少考據成果令人信服。楊義說道：「平心靜氣地考察就不難發現，桐城派實際上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學和清代學術的一個綜合體，它是把中國傳統文章的一切精華、傳統道學的一個脈絡和傳統學術的一種精彩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註3〕（《桐城派與「文章的清朝」》）誠然，乾嘉時期桐城派的出現並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現象，它更多的是一個文化現象，僅僅以純文學的觀點來探討是不全面的。乾嘉時期，程朱理學普遍受到了批判，在考據學風下，經史考證成了文人們無法迴避的問題，重學成了時代的風尚，這股學風對文學的影響，目前並沒有人作全面、深入的探討。其實，考據學風不僅影響了作家的作品風格，而且還影響了他們對文學價值的判斷。可惜的是，當前對乾嘉作家的研究大多都沒有將學術風氣、學術思想融入文學研究之中，即使有提及，也只是作為背景進行介紹，沒有將學術思想與文學觀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進行分析，這是很遺憾的。此外，這一時期程朱理學的價值觀念受到了懷疑，儒家經典考證煥發出來的人性思想已滲透到文學之中。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相對穩定促使文學創作出現了大眾化的趨勢，不僅詩人數量巨大，而且詩學思想也呈現了平民化的趨勢。嘉道以後，國事日非，程朱理學擡頭，這股大眾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對於乾嘉時期這股具有思想解放性質的大眾化詩歌浪潮，目前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多數研究者只是關注到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文學創作的繁榮，而沒有追問盛況的實質及其所具有的內涵。

在乾嘉時期的文學研究中，我們也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理論的建立並非一瀉無遺，而是在衝突、鬥爭中建立、發展的。乾嘉時期的文學具有複雜的格局，文學除了要承受考據學風的巨大壓力外，內部也因價值取向的不同而彼此據理力爭。桐城派姚鼐「義理、考據、辭章」的古文理論與時代學術是密不可分的，以程朱理學為歸的價值取向讓其與漢學處於緊張的對峙之中，文學上的爭論是漢宋之爭的延續。乾嘉駢文中興又讓桐城派腹部受敵，古文的「正宗」地位受到了挑戰，駢散孰為「正宗」一時成為爭論的焦點。性靈派的袁枚在學術上反對漢宋，文學上反對唐宋之爭，獨樹一幟，既與漢學家論戰，捍衛文學獨立地位，又批評同時代的肌理派、格調派、神韻派，

〔註3〕 見學術會議論文集《桐城派與明清學術文化》，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頁。

領袖乾嘉詩壇，性靈派的這一地位是在爭論中壯大起來的。翁方綱的肌理派以考據入詩，以宋詩格唐詩，應該說是時代學風使然，是乾嘉學術在詩學上的反映。他除了面對性靈派的指責，還必須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他的理論面臨著內外的雙重考驗。沈德潛的格調說既承受了康熙中葉宋詩熱帶來的壓力，又受到了袁枚性靈派抵抗及翁方綱對格調的肢解，時代環境及文學論難使得格調說由盛而衰。縱觀乾嘉時期主要的詩文流派，我們可以發現多元的文學思想在並爭中生存，在論難中完成了其理論的構建。對於乾嘉時期的文學理論，目前主要以靜態的分析為主，對不同學人、流派在理論建立過程中的論難、互動缺乏深入的分析。如對考據與文學的爭論，研究者主要關注桐城派與漢學陣營之間的爭論，其實兩者的爭論主要是在經學而非文學。考據與文學之爭主要是在袁枚與漢學家之間進行，對於這個問題，論及的很少，即有論及者，也只是簡單地陳述。如王達敏在《姚鼐與乾嘉學派》一書中論提及這場爭論，但作者主要就文學與考據孰優孰劣這一問題進行闡述，並沒有就文學與考據之爭的內涵進行充分地分析，這是很可惜的。乾嘉時期駢文與古文的爭論也是如此。研究者注重梳理阮元、凌廷堪、姚鼐等人的文論，而對爭論的實質、內涵往往只是單言片語，缺乏細緻的分析。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對中國思想史的流變概括為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清代樸學，這個概括現在仍然為學界所接受。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學很少能作為一種純粹的藝術門類獨立地存在，它往往與經學、史學糾纏在一起，既受經、史的制約，又反作用於經史。乾嘉在經史考證上的成就令後人讚歎，而對這一時期的學術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卻少有人探究，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同時，乾嘉時期在經濟發展、理學思想鬆馳、人口迅速增長的歷史條件下，詩文創作出現了繁榮。這一繁榮實則是文學創作的大眾化、平民化，這股大眾化的浪潮不僅加深了理學的危機，而且促使文學觀念出現了嬗變。由於文獻挖掘、整理的滯後，這股大眾化的浪潮現在也沒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夠的關注，這是乾嘉文學研究中的一大不足。乾嘉時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時期，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終結時期。本書試圖突破現代學科分類的局限，在還原乾嘉時期政治、經濟的歷史語境下，結合這一時期的學術特點，以文學爭論為主要研究內容，探討在多股勢力影響下文學理論的論爭與嬗變。

第一章 考據與文學之爭

鑒於明代的覆亡，清代的學術由虛尚實，顧炎武「經學即理學」成了清代學術的指導原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對《古文尚書》的辨偽、胡渭《易圖明辨》對以「五行生成數」和「九宮數」為「河圖」、「洛書」的歷史淵源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典信任的危機，空談心性已不為時代所容，樸實無華、無涉玄虛的經史考證逐漸成為時代的強音。乾隆、嘉慶年間，在文化政策高壓及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經史考證的熱潮被推向高潮，上自四庫館，下至富豪商賈、普通士子，無不以博學考據為榮，其影響所至，波及近代。乾嘉時期的文學創作也在承平的社會環境下達到了歷史的高峰，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的著錄，乾隆朝詩文家有 4200 多人，詩文集近 5000 種，嘉慶朝詩文家 1380 多人，詩文集近 1500 種，乾嘉兩代的詩文創作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之前的任何一個朝代。詩文創作的繁榮與經史考證的時尚成了這一時期獨特的風景，目前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由表及裏，由粗及微，研究方法及視角呈現多樣性，成果也很顯著。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多側重於作家作品或流派，對於經史考證與文學如何在這一時期的文化生態中互消互長卻很少有人問及，對於兩者的爭論源起、發展與乾嘉學術流變的關係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關注，本章試圖在社會歷史環境及學術思潮的背景下探討兩者的關係。

1.1 考據的主流話語權與文學創作的繁榮

1.1.1 考據的時代主流話語權

清代的考據學發軔於顧炎武，經由方以智、胡渭、閻若璩、毛奇齡、梅文鼎等人的推動至乾嘉而達到鼎盛。從乾隆一直到嘉慶末期，經史考證一直佔據著學術的主導地位，袁枚在《隨園詩話》感慨道：「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寫字，便究心於《說文》、《凡將》，而束歐、褚、鍾、王於高閣；略知作文，便致力於康成、穎達，而不識歐、蘇、韓、柳為何人。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皆因鄭、馬之學多糟粕，省費精神；蘇、米之筆多放縱，可免拘束，故也。」〔註1〕梁啟超也說：「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闕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內行話。這些學者得這種有力的外護，對於他們的工作進行，所得利便也不少。」〔註2〕考據取得了學術話語的主導權，文學、理學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四庫館的成立更是加重了這種學術風氣，四庫館臣多數是漢學家，他們不僅以考據相切磋，而且還將經史考證列入科舉考試的範圍，這對士子們的學習導向無疑是具有指引性的。「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藪，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著。」〔註3〕「乾隆中，大興朱氏以許鄭之學為天下倡，於是士之欲致身通顯者，非漢學不足見重於世。」〔註4〕（《贈何原船序》）姚鼐在《鄉黨文擇雅序》中說道：「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江永）說者，乃褒錄焉。」〔註5〕漢學家以經史考證列入科舉考試的做法雖然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但這種批評的呼聲極其微弱，根本沒法動搖他們的信念。從事考據具有極大的號召力，達官富賈、漢學大師們也以培植後學為樂事，焦循在回憶自己的學術歷程時說道：

乾隆己亥，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按部至揚州。循年十七，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惡浮偽之習，試經與試賦

〔註1〕 袁枚，《隨園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39頁。

〔註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24頁。

〔註3〕 昭槤，《嘯吟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18頁。

〔註4〕 張星鑒，《仰蕭樓文集》，光緒六年刊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註5〕 姚鼐，《惜抱軒全集》〔M〕，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第43頁。

尤慎重，用是試者甚罕。循幼從范先生學詩古文辭，至是往試，公取爲附學生。覆試日，公令教授金先生呼曰：「詩中用『韞縠』字者，誰也？」循起應之。教授令立俟堂下，良久，燈燭光耀，公自內出。循拜，公止之。公視循衣冠殊樸質，顏色甚懌，問二字何所本？循以《文選·桃花賦》對，謹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循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顧謂教授金先生曰：「此子識字，今入郡學以付汝。」詢循所寓遠，令巡官執炬送歸寓。明日，公謁，公復呼循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循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循之學經，公之教也。〔註6〕（《感大人賦·序》）

劉文清即乾嘉名臣劉墉，焦循所說的「學經」其實是在以「識字」爲基礎的經文推闡。焦循在這段回憶充滿了以考據爲人生追求目標的自豪感，他對劉墉的讚頌乃是同聲相應之鳴。劉墉等達官對考據的人才的引薦培養具有傳統「以吏爲師」的間接性，這一時期眾多的考據大師如惠棟、錢大昕等則通過私塾或官方書院的形式直接有意招引培養考據人才，考據的學理性和師承性更加彰顯。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記載有：「先生（朱筠）提倡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弟子考古講學，釃酒盡醉而已。」〔註7〕以「考古講學」爲雅興的集會是乾嘉學風的體現，這樣的集會在乾嘉比比皆是，它不僅有利於學術的交流，而且對培育考據的學風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考察乾嘉漢學家的生平，我們不難發現，多數學者都有從詞章轉向考據的經歷，王鳴盛、錢大昕、朱筠、趙翼、洪亮吉、孫星衍、焦循、凌廷堪等人都是由詩人轉入考據一路，他們轉向的緣由與學術風氣有著密切的關係。段玉裁說道：「予少時慕爲詞，詞不逮自珍之工。先君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予謹受教，輟弗爲。」〔註8〕凌廷堪在《與張生其錦書》中說道：「近日學者風尚，多留心經學，於辭章則卑視之，

〔註6〕 焦循，《焦循詩文集》〔M〕，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第13頁。

〔註7〕 江藩，《漢學師承記》〔M〕，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81頁。

〔註8〕 北京圖書館編，《年譜叢刊》第108冊，《段玉裁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

而於史事，又或畏其繁密。」〔註9〕時代學術風氣我們由此可以窺其一斑。《四庫全書總目》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的主流觀點，「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註10〕王鳴盛在評論當時的學風時說：「有空談妙悟，而徒遁於玄寂者矣；有泛濫雜博，而不關於典要者矣；有溺意詞章，春華爛然，而離其本實者矣；有揣摩繩尺，苟合流俗，而中虧精意者矣。此皆不足務也。是故經學爲急。」〔註11〕（《贈任幼植序》）他所說的經學其實便是經史的考證。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說到：

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並且人們知道如何去解釋它，那麼我們在這作品中所找到的，會是一種人的心理，時常也就是一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一種種族的心理。〔註12〕

丹納所指的是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解讀，其實，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解讀具有時代性，在中國歷史上，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何嘗不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魏晉玄學、兩宋理學、明代心學無不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心理，乾嘉的考據學乃是清代學術「時代的心理」的表徵。

這一時期考據的興盛既與漢學家的實績和褒獎後學分不開，又與最高統治者對理學的態度有關，精通清朝典章制度的皇族昭槤說道：

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權，正人與之梗者，多置九卿閒曹，終身不遷，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習理學者日少，至書賈不售理學諸書，予前已具論矣。近年睿皇帝講求實學，今上復以恭儉率天下，故在朝大吏，無不屏聲色，減駟從，深衣布袍，遂以理學自命矣。如李侍郎宗昉、黃給諫中模，往昔皆以聲色自娛者，近乃絕口不談樂律，芝岩會客，必更易布袍，然後出見，以自詡其節儉。亦一時風氣然也。〔註13〕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統治階級雖然不能直接主導學術的風向，但其

〔註9〕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26頁。

〔註10〕 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上冊凡例，第18頁。

〔註11〕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乾隆十三年刻本影印，卷十五，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註12〕 馬奇主編，《西方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3頁。

〔註13〕 昭槤，《嘯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03頁。

喜好卻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乾隆在即位之初，曾一度對宋儒推尊不已，「居恒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沉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註 14〕但過不了多久，他對宋儒開始不滿，「洛、蜀之門戶，朱、陸之冰炭，已啓相攻之漸。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鑒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不可勝數；而方以死節殉難者多爲有光於古，收講學之效，則是倣也，徒成其爲害。眞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註 15〕其實，乾隆對宋儒的不滿首先是他看到了僞理學的欺世盜名，他說道：「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註 16〕乾隆不滿宋明理學，一方面，對僞理學深惡痛絕，認爲由此會蝕壞國家，另一方面中國的封建社會到了乾隆在集權上達到了空前，傳統的君賢臣能的已不符合乾隆時代的要求。乾隆對程頤「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的論調很不滿，他說：「蓋『君德成就責經筵』，是矣。然期君德之成就，非以繫天下之治亂乎？君德成則天下治，君德不成則天下亂。此古今之通論也。若如頤所言，是視君德與天下之治亂爲二事，漠不相關者，豈可乎？而以繫之宰相。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唯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註 17〕（《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嘉慶年間，雖然理學有所擡頭，但談虛論玄仍然不爲最高統治階級所取，實用的理學才是他們所需要的。

乾嘉經史考證是有感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而發，梁啓超認爲它是對理學的「反動」，余英時更傾向於是經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儘管對乾嘉考據的學理認識不一，但是對乾嘉考據反對宋明理學的看法卻是一致的。這一時期的理學普遍成了人們批判的對象，「明季以來，宋學太盛。於是近今之士，競尊

〔註 14〕 見《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影印本，卷一二八，中華書局，1985 年，第 875～876 頁。

〔註 15〕 弘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卷十八，第 700 頁。

〔註 16〕 見《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影印本，卷一二八，中華書局，1985 年，第 54～55 頁。

〔註 17〕 弘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卷十九，第 708 頁。

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爭先焉。」〔註 18〕人們對理學不滿，宋儒也成了漢學家們打擊的對象，汪中甚至見人提及宋儒便漫罵不休，「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註 19〕（《汪容甫墓誌銘》），致使其子汪喜孫拜姚鼐為師學習古文時，姚鼐仍心有顧忌，婉言謝之。章學誠深有感慨地說道：「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註 20〕正因如此，宋明理學給退居邊緣，學習理學的人日見其少。「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已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坊中，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貲本耳！』傷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歟？」〔註 21〕以理學自任的姚鼐也無奈地說道：「吾在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而坊間書賈至無此書。」〔註 22〕（《與陳碩士》）朝鮮使者託紀昀購買理學的書時，紀昀也明確告之市面已無此類書。余英時在分析乾嘉時期學術時說道：

當時北京提倡考證運動最有影響力的領袖是朱筠和紀昀。朱筠河在經學上反對宋儒的「蹈虛」和「雜以釋氏」，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來了。紀曉嵐則比朱筠河更為激烈，他可以說是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曉嵐是四庫全書館的首席總纂官。通過這一組織，他廣泛而深入地將反宋思潮推向整個學術界。後來全書纂成，《總目提要》二百卷的編刻和頒行曾由曉嵐一手修改，所以其中充滿了反宋的觀點。誠如余嘉錫所指出的，曉嵐「自名漢學，深惡性理，遂峻詞醜詆，攻擊宋儒，而不肯細讀其書。」曉嵐排程、朱，在《提要》中是用明槍，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則專施暗箭。《筆記》中許多譏笑罵「講學家」的故事都是他挖空心思編造出來的。東原入都之次年（1755）即館曉嵐家，其《考工記圖》也是曉嵐為他刻行的，而

〔註 18〕 袁枚，《隨園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第 49 頁。

〔註 19〕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 319 頁。

〔註 20〕 章學誠，《文史通義新編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33 頁。

〔註 21〕 昭槤，《嘯吟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317～318 頁。

〔註 22〕 姚鼐，《惜抱軒尺牘》，宣統二年國學扶輪社刻本，卷七，第 13～14 頁。